

杨志军:归根结底是要探索人



杨志军

《雪山大地》
杨志军 著 作家出版社

杨志军

当代著名作家,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雪山大地》《环湖崩溃》《海昨天退去》《大悲原》《藏獒》《伏藏》《潮退无声》《巴颜喀拉山的孩子》《三江源的扎西德勒》等。曾获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《当代》文学奖等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。

“追求大地般的重量和雪山般的质感。青藏高原上汉藏两个家庭相濡以沫的交融,铸就了一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碑。在对山川、生灵、草木一往情深的凝望和咏叹中,人的耕耘建设、生死歌哭被理想之光照亮。沧桑正大、灵动精微,史诗般的美学风范反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历程。”

这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给予杨志军《雪山大地》的授奖词,准确地描画了他作品的厚度、宽度、高度与美学风格。

从西部高原走出来的杨志军,多年来用辛勤的耕耘,将一个雄伟壮美又略带神秘色彩的高原世界呈现给众多读者。雪山圣洁,大地苍茫,生命高贵,万物有灵……这一切因为有了对人的观照,而具有一种超越地域、超越文字的力量与哲学之美。

从生态小说、战争小说,到都市小说,到史诗般的民族叙事,对所有这些题材和内容的触碰或者深入,于杨志军而言,都是对人的一种探索。他希冀能够建树一种人的坐标,“尽管这个坐标我现在也没有提出来,但我在不断地探索。”

现代快报+记者
白雁 姜斯佳/文
徐洋/摄

大读家

与他们
读书人,
思想现
作者

唤醒对历史的一种情感

读品:《雪山大地》塑造了一个由强巴、苗苗、才让、梅朵等多位汉人、藏人共同组成的四代人的大家庭,能谈谈您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吗?

杨志军:其实并没有完全根据生活中的某个人的事迹来塑造人物。比如说我母亲是医生,我父亲是记者,他们经常下乡,那么小说里的生活和情节肯定是有他们的影子。我之所以用“父辈们”而不用“父亲”这个词汇,是因为“父辈们”表明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,我把他们的生活塑造在强巴或者塑造在苗医生身上。也有许许多多的藏民,他们的情绪、心态和行为,我塑造在角巴、桑杰、才让、果果这些人的身上。比如说小说里的办学这件事情,在我当记者的时候,我去草原上采访,经常碰到寄宿学校、帐篷学校,学生都是住校的,放假或者过节、周末的时候,老师就得把学生一个个送回去,我把采访到的这些事情就放在强巴身上。当然如果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,大家都觉得这个写得像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,那就更好了。

读品:感觉您塑造人物时,除了尽可能贴近现实的描摹,还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,是有意为之吗?

杨志军:所谓的理想主义,是不是说这种人是根据理想塑造出来的?这里有一个问题,就是生活中存不存在这样的人?我的回答是有的,不光在牧区,不光在草原,在整个青藏高原,我的父辈们,还有我们这一辈中在那个地方工作过的人。曾经为了雪山大地的现代化进程付出了努力的“父辈们”,我们可能正在把他们遗忘,这种遗忘是不应该的。如果他们生活在很安逸的城市里,可能会活到八九十岁,但是在高原工作一辈子,有些人可能五六十岁就没了。这种情况在我父辈的那一代是很多的,我父亲就是因为肺心病去世的,去世时65岁。肺心病和高原反应有关,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病,他可以活得更久。时代给了他们一种那样的生活,他们欣然地接受,因地制宜地把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全部投入,尽自己的能力把事情做好,很坦然很平静地去做,然后很平静地死去。写这部小说,是唤醒过去的记忆,唤醒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情感。我觉得我要是不把它写出来,那么很可能就没人再关注他们,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。

小说里的人物塑造,在今天看来可能是理想主义的,但在当时恰恰就是他们很自然很常态的一种表现。要说有理想化的话,生活本身就是理想化的,那一代人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人。改造一个世界,把自己工作的这一片土地变得越来越好,越来越走向文明,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举动。

读品:书中人物尤其是藏民的口语表达都非常生动,在写作《雪山大地》的时候这些语言有没有影响到您的构思和表达?

杨志军:语言的法律是习惯,当地的牧人经常说这种话,就形成一种习惯,这种表达有一种文化的延续。这些语言当中的比喻,有些是固定的,有些是新鲜的。自然、河流、天空、太阳、月亮这些形象化的东西在藏族牧人的脑海里是很多的,他们认为万物有灵,习惯于人格化的表达,比如动物的人格化、山脉的人格化、所有自然的人格化、牧草的人格化、花朵的人格化。我一到牧区就会变成用他们的方式来和他们交流,比如倒装句,还有一些习惯性的称谓、惯常的比喻。藏族人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述,用酥油、奶渣、牦牛比喻,通过他们的对话,生活方方面面都能展现出来,比如怎么打酥油,

怎么酿制酸奶,怎么吃糌粑,怎么编织牦牛绳和氆氇,怎么穿衣打扮,都有。牧人说他思念你,他会先说,昨天晚上我睡不着,脑子里跑来跑去就是你嘛,你一句话也不说,我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。再比如,他去看病,说眼睛不好,他会说,你看我的眼睛里头有没有东西,眼睛里头山也来了,水也来了,我连我的羊都看不见了。他们不用概念来说,都是用形象的比喻,有很多创造性的语言。文学面对这样一种语言,其实就面对着一座宝库,你可以不停地挖掘。

给人提供一种坐标

读品:您早期的作品被称为“生态小说”,为什么近几年会转向,将目光投向父辈们的建设史,将民族文化与历史作为表现对象?

杨志军:作为写作者,首先想的是一部要跟一部不一样,想要避免重复,就必须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思考角度,以及思想表达。我早期的作品,比如《环湖崩溃》写的是生态,后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对生态的表达。事实上如果现在回头看的话,《环湖崩溃》不光是一种生态,最终是回归到人,思考人应该怎样达到一种爱的境界。这样一种表达一直持续到现在,比如后来的《伏藏》和《藏獒》,也是一种善、美、爱的表达。后来我写了几部青岛的作品,比如《潮退无声》《无岸的海》《最后的农民工》《你是我的狂想曲》,这些作品都延续了关于人的塑造、关于理想的追求、关于爱的表达。包括《雪山大地》,归根结底都是要探索人的模样,给人提供一种坐标。尽管这个坐标我现在也没有提出,但我在不断地探索。

读品:《雪山大地》入选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和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,这部作品是为文学创作计划量身打造的吗?

杨志军: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这两个计划还没有实施。《雪山大地》写的是我的父辈们的生活,还有我自己的生活,还有朋友们的生活,几代人的生活。从我的童年开始,我就记忆和经历这些事情。我写我的经历、我的积累,生活的积累、感情的积累,还有我对青藏高原、对这段生活、对历史的认知的积累,这种积累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那里头的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头已经活了很久了,我希望别人能了解它、阅读它,也希望别人喜欢它。我是一个写作者,这种生活我迟早是要写的。就在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,中间得到了编辑的约稿。无意当中契合了,那么写得就更加踏实,情绪更加的饱满。

读品:您定居青岛多年,但几乎每年都会回青海生活一段时间。草原这些年有哪些明显的变化?

杨志军:感触很多。我几乎每年都回去,我90岁的母亲和很多亲戚朋友都在那里。一方面是探亲,一方面肯定还要去草原牧区走一走。现在的变化很快,如果你一两年不去,那里就会有一些变化,而且是比较大的变化。不光是人变得陌生了,或者是多了一些建筑,或者是多了几条街道,不光是这种变化,而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思维方式、精神状态,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,都在变化。比如前几年我回草原,还能看到黑色的牛毛帐篷,到帐篷里头去喝酥油茶、吃手抓肉,但是短短几年过去,现在就很少了,都定居了,住到房子里去了。定居可以带来很多好处,对生活、生产都有好处。从逐水草而居、住牛毛帐篷那种生活方式,变成定居点,后来又变成几乎和都市人一样的生活,人们适应变化的能力很强,深刻又奇妙。原先逐水草而居的时候,每年都得搬迁,冬窝子、春窝子、夏窝子、秋窝子,牧民每

年至少要搬迁四次。往往不止四次,因为住秋季草场的时候,不可能一直在一个地方,周围的牧草,你的牛羊很快就吃没了,你得到有牧草的地方去,所以在秋季草场内部,你也在不断地搬迁,有时候是七八次、十几次搬来搬去。这样一种生活方式,首先是不稳定,有时候遇到暴风雪,帐篷很容易被压塌,就要挖雪窝子。没有床,帐篷一搭,把毛毡铺在地上一睡就行了,再加上高原属于冻土带,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牧民长期以来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病就比较多。再有就是饮食问题,天牛羊肉和奶制品,高蛋白高脂肪,虽然营养很好,但是不均衡,也可能导致一些老年性的疾病。定居以后,所有的变化都是往好处走的,医疗、用电、暖气、教育,很多问题迎刃而解。同时带来的一个好处,自然状态好了,草原的生态恢复了。这些年,牧人的观念也渐渐转变了,不把牛羊当成不动产、当成财富,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商品,去交换,换来财富。从生活方式、生活状态到观念的改变,我觉得是革命性的变化。

必须把它当作一回事儿

读品:许多著名的作家都会提及经典作品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,对您影响最大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是哪几位?

杨志军:托尔斯泰对我影响比较大,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雨果、但丁、莎士比亚,这些都是国外的作家。中国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,另外,古代的像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,包括陶渊明、屈原,对我影响也大,他们对我的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、人格上的。托尔斯泰是一位把自己的作品和人格完美统一的作家,他提倡仁慈,提倡对弱者的同情,提倡怜悯,在作品里有这样一些感情的表达,和他在生活中所拥有的感情、情怀天然契合,是一致的,所以佩服他。他不光是在完成作品,不光是在塑造人物,同时也通过作品在完成他自己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样一个人,在为信仰焦灼的时候,他就像个疯子一样,这就是天生的作家,仿佛他一生下来就处在一种写作的状态。雨果写《悲惨世界》,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就是雨果自己心态的写照,是他个人精神境界的一种表达。他们是从精神深处来塑造整个人类,从人应该达到的一个标准,来弥补人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精神残缺。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塑造人,建树人的模样。

读品: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?在您看来作家的责任是什么?

杨志军:其实从写《环湖崩溃》和《大湖断裂》开始,我就认定了此生就是要探索“人”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。几十年下来了,已经40年了,我没有变,到现在还在探索,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。关于人的标准,对于人性的探索,尤其是对人性真善美的探索,我自始至终都在做,不遗余力地去建构关于我自己的“人”的理想。

我不经常使用作家这个称呼,我更愿意称呼自己是一个写作者。写作者其实就是要完成他内心的一些诉求,他最终写出来的都是他的独特的生命体验,这种生命体验只有和他的内心世界发生碰撞、发生契合的时候,才是有价值的。这样的内心世界有写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,同时还有对生活、对生命、对历史、对未来的一种认知。一个作家,其实可以不对历史承担什么,但是必须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承担足够的义务。内心世界决定了作品的质量,也决定了作品到底能够走多远。作品最终就是写作者心灵世界的写照,你必须把它当作一回事儿。